

华北自治运动 与地方实力派的政治选择^{*}

贺江枫

摘 要：华北自治运动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不仅是日本有预谋的蚕食华北、实施其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步骤，亦是《何梅协定》达成后，在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之下，华北政治失序、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华北各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与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为保存实力，一方面均主张对日妥协退让，另一方面他们对待中央的态度迥异，地缘政治成为影响各派势力政治选择的重要变量。此外，日本蚕食华北，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犹疑不定，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在日军侵略的外在压力下愈发激化，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华北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晋系 蒋介石 宋哲元 何梅协定 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3年，日军兵临平津，国民政府被迫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此后，国民政府主张对日妥协，华北局势表面暂趋稳定。然而就在国民政府高呼“中日亲善”之时，1935年，日军先后制造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自治运动，各地方实力派蠢蠢欲动。^①内忧外患之下，华北危机日益深重。6月19日，驻日大使蒋作宾致电南京外交部，不无忧虑地报告到：日本“以中国将趋统一，认为不利，欲在北方组织一反中央势力。先以冀晋察绥鲁为范围，俾与中央脱离，以便为所欲为。现正积极进行，并欲利用阎主任为傀儡”。^②此后，面对日军威逼利诱，韩复榘、宋哲元含糊其辞、游移不定，阎锡山却逐渐转向与中央合作。蒋介石认为，“倭寇在华北策动五省自治独立，必欲于六中全会或五全大会时达成其目的，对各省主官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鲁韩尤为动摇，而阎则深明大义也”。^③

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态度的不同实则反映的是华北地方实力派面对日军侵略，在夹缝之中谋

^{*} 本文为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抗战时期华北地方实力派研究（1931—1945）”阶段性成果。

① 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往往拥有固定的地盘与规模较大的军队，北伐时期虽然先后投奔或效忠国民党，但时常对国民党中央政权表示怀疑和不满。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② 《蒋作宾致南京外交部电》，1935年6月19日，外交部档案0200101020252，台北“国史馆”藏。

③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均出于此，不再注明）。

求生存的现实逻辑,有其典型性与普遍性。海内外学界围绕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与中日关系已有诸多精深研究,^①但重在探讨国民政府的危机应对与日军侵华政策的演变,至于华北自治运动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各地方实力派,彼此之间如何考量与抉择,缺乏充分探讨。李君山从华北内部权力格局的角度论述宋哲元与华北自治运动的复杂关系,但未展现华北地方实力派内部的差异与互动。马振犊比较分析了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对日态度的差异,但受时代与资料所限,无从展现地方实力派差异变化的具体过程。此外,肖自力通过考察20世纪30年代何键与中央、西南的彼此关系,分析地方实力派政治存在的特性,^②但华北与南方地方实力派所处外部环境迥异,内在逻辑亦有所差异。故而,本文试图探究华北地方实力派在1935年华北危机的复杂局势之下,如何处理与日本、国民政府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而管窥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地方实力派政治选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一、日军侵略与华北政治失序

1933年《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军并未停止对华北的蚕食与渗透,“日方所亟亟求解决之根本问题,为近期的经济合作,远期的对俄作战之军事协定”,“膺白(黄郛)初到华北,未能顺利与之解决,于是日本改变方针,乃向华南、华北各部分别进行”。^③1934年12月,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联合制定《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特别就华北问题提出:(1)逐渐形成南京政府政令不及于华北地区的趋势;(2)扩大日本在华北的各项权益;(3)将华北政权官吏更换为便于日本实施对华政策的人物。^④为落实这一文件,1935年1月4日至5日,包括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内的诸多日军在华高级将领,在大连召开幕僚会议,达成策动华北自治等若干共识:(1)在华北地区,逐渐强化南京政府政令被削弱的局面;(2)对能够实现华北独立的势力予以支援。^⑤

华北军政要务此时名义上虽由国民政府组建的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整会”)与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以下简称“北平军分会”)全权负责,但所能控制的区域仅限于北平及冀东战区各县,晋察冀绥鲁五省仍由各地方实力派分别掌控。东北军自1930年中原大战后长期掌控河北,自1932年由于学忠出任河北省省主席。二十九军亦因长城抗战的缘故进驻察哈尔,

① 代表性论著包括马振犊:《华北地方实力派抗日态度之比较研究》,《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台北:“国史馆”,1995年;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日本因素(1931—1937)》,马俊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内田尚孝:《华北事变的研究:塘沽停战协定と华北危机下の日中関係 1932—1935年》,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光田刚:《中略国民政府期の华北政治(1928—1937)》,东京:御茶ノ水书房,2007年;彭敦文:《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及其变化——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李君山:《全面抗战前的中日关系(1931—1936)》,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

② 肖自力:《南京政府前期地方实力派的政治生存——以何键为中心》,《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③ 《徐永昌致蒋中正函》,1935年7月1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下文简称“蒋档”)00208020000456070,台北“国史馆”藏。

④ 岛田俊彦、杵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戦争(一),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第22—24页。

⑤ 昭和十年一月大连全议ニ於ケル関东军说明事項,1935年1月,満受大日記(密)陆军省A030320004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此后由宋哲元执掌察哈尔军政大权。韩复榘则在中原大战时期助蒋有功，获委山东省省主席，成为独占一省的大吏。尤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自民国建立后长期控制山西，自成体系，逐渐成为华北地方实力派中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广泛的派系。晋系虽在中原大战失败后实力严重受损，但根基尚存，各部经蒋介石、张学良改编后，仍得以保留四军兵力，即军长为商震的三十二军、军长为徐永昌的三十三军、军长为杨爱源的三十四军、军长为傅作义的三十五军。即便1931年8月商震与阎锡山心生嫌隙，率军进驻河北邢台，在冀南、豫北独树一帜，但毕竟同气连枝。徐永昌为山西省省主席，傅作义为绥远省省主席，晋系仍旧控制晋绥两地部分军政权力。故而阎锡山能够于1932年利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无暇顾及的时机，重掌晋绥政权。“查阎先生此次重主晋绥军政以来，虽声言从事建设，不问外事，而骨子里绝不如此简单，殆属人所共知。”^①

鉴于晋系在华北实力最为雄厚，日方迅即将其确立为策动华北分离工作的重要拉拢对象。事实上，日方对阎锡山的联络早已有之，“九一八以后，日本军政人员来晋者时有所闻，就中往来最频且最惹人注目者为柴山氏（柴山兼四郎），与阎会晤之地点或在河边，或在省垣”，“并屡有表示”。^②1934年3月26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柴山兼四郎派人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晤，明言目前负责华北军政大局的政整会委员长黄郛与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皆不能主治华北”，日军必欲打倒而后快，至于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不无可虑”，难堪重任，希望阎锡山出面重组华北政局，同时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察哈尔省省主席宋哲元“都非换不可”，为拉拢阎锡山，特别强调“于拟换以商，因商曾为阎先生部下也”。阎锡山面对日军诱导，态度含糊其辞。^③

随着推动华北自治成为日本侵略华北的首要目标，日军亦加速对阎锡山的引诱工作。1935年1月初，柴山兼四郎派人警告阎锡山：“日本决不能坐待日俄战时，令中国袭击其后路，为自救起见，不能不造成华北为日本绝对友谊区域”，希望晋系迅即与日本联合策动华北自治，“今日华北，阎先生如能领导之，与日谋妥协，固甚佳，否则日本亦自有法”。阎锡山初始“表示苦无应付策”，当其得悉日军要求晋系选派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贾景德其中之一与日谈判，“乃曰：此有办法矣”，赵戴文主张由傅作义负责与日谈判，但傅作义再三推辞，晋系内部意见分歧，“请次陇（赵戴文）走河边回复之”。1月14日，阎锡山召集部属再次商议，决定“对日方之示意应再沉静，以观其究竟”。此次会议中，阎锡山“话极多，过虑及不切实际的想象亦复不少，惟结论至扼要”。2月8日，阎锡山获悉1935年1月4日日军大连会议详情，表示对日军仍应暂取观察态度，“因日甚疑阎先生倾赤”，但为消除日军顾虑，特令靳祥垣“往解释物产证券与劳资问题之意见”。^④然而至5月河北事件爆发，日军提出撤销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中央军退出河北、撤换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等多项无理要求，何应钦在日军压力下被迫应允。《何梅协定》使得国民政府在华北的权力基础荡然无存，同时东北军被迫他调，河北省省主席于学忠亦宣布辞职，华北各派势力的脆弱平衡被日军打破。

河北省省主席的人选随即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目标。围绕河北省府改组问题，日方跃跃欲试，急欲安插亲日人士。日军鉴于商震与阎锡山关系密切，意图拉拢晋系，希望具有亲日背景的商震出任河北省省主席。^⑤蒋介石则有意令何应钦重新北上，执掌河北。他于6月17日致电

① 《日本对华军事外交情报（二）》，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010003，台北“国史馆”藏。

② 《日本对华军事外交情报（二）》，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010003，台北“国史馆”藏。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74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23—225、235—236页。

⑤ “Resume of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ituation in China,” August 31, 1935,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Decimal File 893.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何应钦,强调“华北环境实为最苦痛恶劣之环境,然亦为民族生死存亡最大之关键,盖中本不欲强兄再任此难局,然兄不北返,则事实上以后华北纷乱日甚一日,更难收拾,此时惟有忍辱含羞,以维现局,而收人心,为我党国保持革命历史一线之荣光”。他认为何应钦“此时直接回平又非得计,故只可以河北主席名义先到保定就职,而将分会事务逐渐移保维持三月,再另觅人替代,此乃为今日惟一救国之道”。^①为慎重起见,蒋介石同日致电阎锡山,征询华北应对方略,“华北事态急变至此,此中经过想尊处必略已有闻,瞻念前途,实深焦虑,如何应付,我兄老成谋国,卓见所及,切盼电示”。^②阎锡山对蒋介石的信任颇为得意,^③强调“为与否,当以国家大义为准,不能为威迫利诱所操纵”,^④当即召集赵戴文、徐永昌商议如何回复蒋电,“结果以为乘机取消北平军政分会,使日在华北寻不见整个对象,则今后各省市纵受压迫,亦只枝节或部分的,此意并电何敬之主持,免受整个压迫”。^⑤阎锡山遂即致电蒋介石,主张裁撤北平军分会与政整会,由何应钦主掌河北。

阎锡山所提由何应钦担任河北省省主席的建议与蒋介石不谋而合,无奈何应钦再三推辞。6月23日,汪精卫询问晋系驻南京代表台林一,可否由徐永昌“犯难一往否?”徐永昌认为如若他出任河北省省主席,有引火烧身之虞,断然回绝,“当答以河北事难易及余个人愿去与否?均为另一问题!盖河北事果难,则谁去亦难,吾人于此时会,不应避难就易。今只就山西与日本交涉言,是否尚系两重,若余往,则恐有联成一气之虞”。阎锡山深以为然,“立电汪,仍主敬之北来”。^⑥局面僵持之下,蒋介石决定商震执掌河北,汪精卫认为“此次启予(商震)任河北主席,百川(阎锡山)颇不满”。为安抚阎锡山,汪精卫乃建议“赵丕廉可调为国府委员”,“可使百川安心也”。^⑦6月29日,汪精卫请赵丕廉向阎锡山特为解释,商震出自阎部却又弃阎锡山而去,但毕竟同属晋系,因此阎锡山当即表示商震“亦甚相宜”。^⑧

局势恶化显然不止于此。1935年6月张北事件爆发,日军本欲借此逼迫国民政府罢免宋哲元职务,调离二十九军,但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冀图离间二十九军与国民政府及商震之间的关系,“谓如将宋军他调,中央必另以他部填防冀察,反不如宋军之可利用云云。惟关东军始终坚持其主张,遂令土肥原向我提出免宋(宋哲元)及赵(赵登禹)师离察之要求,待我方照办后,彼复将计就计,乘机挑拨宋与中央与商阎间之感情,不曰宋之免职令非出自日方之要求,即曰商启予曾电蒋委员长,对廿九军表示不满,此种伎俩近已逐渐施行,意在使我内部自生变化”。^⑨张北事件使得晋系有唇亡齿寒之感。6月27日,徐永昌面见阎锡山,强调“察省关系晋绥较河北特甚,吾人安可坐视”,力主阎锡山向中央建议由宋哲元部属秦德纯出任察哈尔省主席,使二十九军仍可掌握察省。阎锡山表示赞同,迅即致电中央,同时决定派黄胪初劝说秦德

of the United States.

①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35年6月17日,蒋档00208010300021072,台北“国史馆”藏。

② 《成都蒋委员长铤申密蓉电》,1935年6月17日,阎锡山档案(下文简称“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2页。

④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阎锡山日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

⑤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2页。

⑥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6页。

⑦ 《汪兆铭致蒋中正电》,1935年6月27日,蒋档00208020000454135,台北“国史馆”藏。

⑧ 《复南京赵芷青艳电》,1935年6月29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⑨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5年7月19日,蒋档00208020000455265,台北“国史馆”藏。

纯，“恐其拘泥义同进退，不同意也”。^①二十九军作为西北军旧部，与中央多有疏离之感，“罢宋案”使得中央与二十九军之间的矛盾冲突更趋激化。为避免二十九军被调离华北，宋哲元心腹萧振瀛建议与日本合作，“公开发表改变对日态度，主张中日合作的谈话，这样一方面缓和日本，一方面给南京政府一个颜色看看。他认为这样做，‘官’一定会送上门来，而且官做得会愈来愈大”。^②27日，吴鼎昌向蒋介石密报：“宋部不愿退出华北，正与日方接洽，仍分住察平保，并希望中央予宋以冀察绥靖主任名义，日军方面认宋非国民党军系，且军队比较有力，逼走费事，乐得利用，似有谅解。”^③恰逢28日白坚武煽动丰台兵变，萧振瀛以平乱为名，利用北平军分会委员的名义，急调二十九军冯治安部进入北平，顺势获得北平控制权。

随着二十九军势力从察哈尔拓展至北平，萧振瀛与商震对北平控制权的争夺日趋公开。萧振瀛向中央明言：“商震何功？一日三迁！宋明轩（宋哲元）何罪免职？要求任宋以北平绥靖主任，渠为北平市长”。^④商震与日军关系本甚密切，但此时日本态度有所转变，“惟近来日人态度似稍变，叔鲁（王克敏）曾言：土肥原数日前在津约商之秘书刘继昌往谈，谓河北情形复杂，不易应付，商主席对此有何办法？刘不能答。土续称，商来津已逾半月，未见有何办法，尚无相当把握，河北不如不就为妙”。^⑤商震内外树敌，压力倍增，阎锡山极为忧虑，“谓启予不易就职，以日方既戏弄之于外，而万（万福麟）、宋等复痛恶之于内，前定五号就职，今已后推矣”。^⑥在商宋政争的背景之下，阎锡山认为黄胪初赴津与宋哲元联络已无必要。

日军窥悉华北权力格局之关键，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驱逐华北中央军势力，随着《何梅协定》的达成，国民政府在日军压力之下被迫禁止中央军进入河北平津地区，因此中央毫无钳制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日方周旋于各方实力派之间，“一面勾结阎锡山，一面联络白崇禧，对阎则谓白已同意，对白则谓阎已同意”，“同时谋煽惑韩复榘独立，以达其分化我整个国家之目的”，^⑦利用华北地方实力派争权夺利的心理，引诱各方与日合作，“谓华北将来非由某某二公者，请一维持，所以政客又在各处奔走”，^⑧从而使得“华北全局对外陷于竞卖状态，对内近于火并状态”。^⑨华北政局又因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拒绝北上，无人负责，顿失重心，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密谋联络，北洋安福系、地方杂军、西南军阀又跃跃欲试，秩序混乱已达极点。

二、华北五省自治暗流涌动

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的爆发，使得于学忠、宋哲元相继被国民政府免职，引发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对自身利益的担忧。韩复榘公开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鲁韩近甚愤慨，认中央处理冀察事件失当，对人谈省主席权不在国府，而在日军部，日本不满于学忠，中央就撤于职，日本

①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8页。

② 李世军：《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123页。

③ 《吴鼎昌致蒋中正感电》，1935年6月27日，蒋档00208010300022001，台北“国史馆”藏。

④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83页。

⑤ 《陈延炯致杨永泰函》，1935年7月7日，蒋档00208020000455200，台北“国史馆”藏。

⑥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85页。

⑦ 《孔祥熙致蒋中正电》，1935年6月3日，蒋档00208020000452026，台北“国史馆”藏。

⑧ 《北平南佩兰、薄以众寒电》，1935年6月14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⑨ 《日本对华军事外交情报（二）》，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010003，台北“国史馆”藏。

不满宋哲元，中央亦撤宋职，将来日本若对我不满，中央也必撤我职”。^①他甚至对国民政府的信任丧失殆尽，认为中央终将放弃华北，“数月来日人希望甚殷，倘我方长此敷衍，仍无具体办法，恐阳历年底，平津方面终不免酿成巨变。届时政府如置平津于不顾，则山东亦当受其影响”。^②他的担心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普遍的生存焦虑。日本天津驻屯军对此有清晰的认知，强调“迄今为止，华北的各实力派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与中央政府打交道，其态度各异。然而，大体而言，都惧怕中央政府对其行使武力，在独立问题上逡巡不前，难下决心。然而自河北事件以来，他们的对日依赖观念逐渐加强”。^③日方虽对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自治运动多有疑虑，但仍试图施加压力，迫其就范。阎锡山面对华北政局重心缺失的混乱局面，亦开始试探性地与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合作，意图实现利益最大化。

晋系此前对日本的“示好”，态度模棱两可，日军颇多微词。1935年6月，日本陆军中央中国科科长大城户前往太原拜访阎锡山，“系代表日陆相与主任直接谈判，问能否与日本提携合作？主任颇难遽答，只好婉词敷衍，谈约三小时，大城户不得要领，稍形不快”，日方对此大为不满。故而，当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计划再次赴太原之时，阎锡山为缓解来自日方的压力，态度开始发生变化。7月13日，阎锡山与徐永昌商讨应对办法，询问是否应报告中央，徐永昌表示：“拒绝应有妥善之法，若来，则必须报告，其如何来一节，可任其自然，不必管其乘车或乘飞机也”。^④至于高桥坦所言华北经济合作，7月9日阎锡山已知悉其内容，“其要点：一、开发山西东北南部各地矿产，建沧石线、大同通州秦皇岛线、赤峰、承德、多伦联络北宁线等铁路。二、开通内外蒙古生意。三、以现在满铁在山东种棉之资本为基础，图向华北扩大，使日本棉供给不缺，不久即在天津设统制机关”。^⑤迟至8月3日，高桥坦才前往太原与阎锡山会谈，徐永昌本欲提醒阎锡山，“注意彼来本有求于我，今因连日各代表之怂恿，应付间必至反有求于彼，犹之关贼于室内，此如何可者？”但当其观察到阎锡山态度暧昧之时，亦不再多言，“主任似已动心，说又何益，彼左右诚多喜事而藉图权利者，且此事与主任大不利，然主任果于不得已时出任艰巨，于人民或有益也，总比石友三等出来强得多”。^⑥高桥坦为诱惑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甚至承诺由晋系干部出任察哈尔省主席，晋系势力可扩展至华北三省。^⑦阎锡山态度模糊，请部属转告日方，“阎先生出来也办不了甚事，因为韩等纵拥阎出，有利他们接受，有害他们不听，徒毁阎与日，希望毫不能达到”，建议由日方“向我们中央要求阎先生出来负责”。日方“认为有理，当本此进行”。^⑧8月8日，高桥坦向外界明言：“阎对华北问题，看测甚透，所论极足，予虽与阎晤谈一次，而印象殊深”，强调“晋省之工业，将来之发展，与冀省农业改进之情形相埒，而与未来之中日贸易亦有重大关系”。^⑨

此外，日方意欲加强对绥远的军事、经济渗透，并清除绥远国民党党部势力，高桥坦会晤

① 《日本侵华情报（一）》，国民政府档案 0010705500006，台北“国史馆”藏。

② 《沈鸿烈致蒋中正电》，1935年11月18日，蒋档 00208010300020124，台北“国史馆”藏。

③ 岛田俊彦、杵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戦争（一），第126页。

④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7、287页。

⑤ 《南京台林一、关蕴中佳电》，1935年7月9日，阎档 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⑥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96页。

⑦ “General Sung Che-Yuan's Increasing,” September 13, 1935,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Decimal File 893.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⑧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97页。

⑨ 《高桥昨日由并返平，至政整会访王代委员长》，《大公报》（天津）1935年8月8日，第4版。

阎锡山、傅作义之时，明确表示，“此后如有日人前赴绥蒙各地侦察等事，请予便利谅解，勿加干涉，但绥省府虽取缔排日行动，然党部为排日机关，现仍存在，前次冀察事件中央与日订约，业将平津冀察等党部撤消，绥察立于同一线上，此事似解决，不应以绥未生事件而与华北各省不一致，要知华北诸省已全无党部矣”，“近闻平绥路党部又暗移绥远工作，此事殊为日方所难允许”。在日方的压力下，8月6日，傅作义致电何应钦，请求裁撤绥远国民党党部，“此次高桥又来正式口头表示，情形势已至决意之时，究应如何办理之处，伏祈示遵”。^① 13日，蒋介石在获悉何应钦报告后，迅即命令叶楚伦、陈立夫，“绥省及平绥路等党部一律自行撤消”。^② 傅作义此举不仅使得日军无从寻衅，更借此清除国民党党部势力，免却中央权力向绥远扩展。至于日军在绥远的经济渗透，傅作义则采取消极抵抗之策，“对于赴西北视察之日人行动密加注意，并通令所部防范日人查询与努力使用国货各问题”。^③

就在日方向晋系施加压力，迫使其与日本合作的同时，各派势力均欲拉拢阎锡山，以期在华北自治运动中占据有利地位。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为使其五省自治更具“合法性”，以李石曾的分治合作理论为依据，“石曾主张晋、绥、察、鲁对外之分治合作，即前此之分治合作是防内乱，今时是对外的。藉分治以缓和外交，藉合作以备万一，因为退让，亦有限度，不到限度，一切隐忍。至不能忍之限度，合而与敌致命，其约略之意义为排除障碍，不作权利分配”。1935年7月，韩复榘密派私人代表柴东生前往太原，与晋系展开联络。7月31日，柴东生向徐永昌表示希望阎锡山出面组织华北自治政权，“盖中央已无力问华北事，吾人若不早自为计，恐山东、山西祸患已到不远，即咱们自己不有组织，等到日本对咱失望后，他随便拥个任何无赖到北平，那时人家假日本力以临咱，恐山东、山西也只好低头服输，所以韩先生意，与其坐以待毙，何如早自打算，不过今日之事，韩决无任何野心或权利思想，纯为华北自身打算，以为请阎先生出任华北艰巨，为今日自救唯一决策”。^④ 8月1日，贾景德在阎锡山的授意下询问徐永昌，“如仍北平现机关或将军政两分会合并，请阎先生出而领导之，惟须徐韩先见面一商步趋，柴意韩到平，太令各方先注意，询有何善法？贾意余（徐永昌）可借看汪，往青岛，韩可到青相晤”。徐永昌表示最好不去青岛，因柴东生曾言“可否怂恿王叔鲁召集五省主席会议，彼（王克敏）正谋召集而未敢遽行者”，在北平与韩复榘会晤更为合适。尽管徐永昌对华北五省联合自治颇多疑虑，“五省问题，我不敢有意见，因为站到国家方面看，前途太黑暗”，但顾忌同僚态度，最终仍勉强答应，“言下贾先生似很失望，然而即此，我也是勉强答复，否则不定误会些什么出来”。^⑤

王克敏自1935年6月出任政整会代理委员长后，为见重于日方，计划8月初在北平召集察哈尔省省主席秦德纯、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山西省省主席徐永昌、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举行联合会议，“商讨关于促进中日提携、开发华北产业、经济合作诸问题，届时关东军将派代表参加”。^⑥ 8月13日，徐永昌从太原前往北平，入住协和医院治病。王克敏初始担心各省主席难以齐聚北平，王绍贤乃向王克敏明言：“徐现在平，韩与最密，即不召，渠（韩复榘）亦且来晤徐，至宋等，则皆在附近，韩既来，他人更无问题也”。此时晋系内部围绕阎锡山主导华北五省自

①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5年8月7日，蒋档00208020000243068，台北“国史馆”藏。

② 《蒋中正致叶楚伦、陈立夫电》，1935年8月13日，蒋档00208020000243068，台北“国史馆”藏。

③ 《袁良致杨永泰函》，1935年9月9日，蒋档00208020000249043，台北“国史馆”藏。

④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85—286、295页。

⑤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95—296页。

⑥ 《日本侵华情报（一）》，国民政府档案0010705500006，台北“国史馆”藏。

治一事展开讨论。贾景德主张与韩复榘联合,“至盼向方(韩复榘)出而倡行”;杨爱源以为不可;徐永昌认为,“如料日对华北无甚遽迫,则尽可以现状安渡下也,若向方料日必将遽进,则所谋是亦有益于国家者,总之,对外交问题,余素主由中央主持者,不过当兹非常之内外情况下,向方苟有利国主张,余决以全力助之。”最终决定采取顺势而为,以利害大小为依归。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急于促成华北五省联合会议,23日再次催促王克敏,“不然徐出院,即归晋矣”。^①孰料28日行政院明令取消政整会,王克敏的计划胎死腹中,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未因此停止,“日本军方仍旧试图依靠宋哲元和其他军事将领,努力扩大在华北的经济、政治权益”。^②

事实上,华北各省拥护阎锡山领导五省自治,可谓各怀鬼胎,即如刘熙众向黄胪初所言:“宋、商是个拥阎的么?韩是个拥阎的么?反之数年来,阎何事能令人满意,柴东生日前黄袍加身式的请阎先生答应出任五省首领,实则袍料在杭州还没有织”。9月13日,韩复榘驻北平代表刘熙众向徐永昌明言,“萧仙阁有一种野心,即拟于一年内运用外交,以二十九军统一华北”,认为“商太滑(一方拉日,一方拥蒋),宋太蛮,(又以萧仙阁能左右宋)无从提携,纵使强合,徒增纷扰”,建议“似不如晋鲁联盟,作华北之砥柱,既可安内,亦可攘外,即以阎先生之耕者有其田为主义,而渐行表见”,刘熙众坦承:“如得晋方赞许,当归语向方也”。14日,刘熙众询问徐永昌,如若赞同他所提主张,可否亲笔致函韩复榘。徐永昌明确回绝,示意“此诸问题赞同则可,不愿自主张也”。^③

日军窥知华北乱象,认为河北事件之后,各地方实力派“彼此相互联络,促进了与中央对抗的决心,这一点非常明显。有鉴于此,我们判断而今华北的独立只不过是时机成熟与否的问题,而且华北独立势必影响到西南及其他各地的杂牌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会给中国全国带来重大变化”,^④加速推进华北自治运动。9月,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武官高桥坦前往张家口,“名虽视察特务机关,实系迫使华北改变局面”,^⑤向宋哲元部兜售华北自治计划,“(一)先唱联省自治,使华北事实上脱离中央。(二)第二步逐渐实现华北之独立组织”。^⑥为引诱二十九军,土肥原特别主张华北税收应由华北自治政权掌握,“第一步截留关盐等各税,年约四千万,予中央根本上之财政打击,以所截留之税款,作华北建设公债基金,由中日伪市场发行公债,其规划甚巨”,^⑦“此为对军人最大之诱惑,最易促成变局之原因”。^⑧经土肥原策动,萧振瀛等主张筹设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鲁方为缓和萧等急转起见,在原则上主张须共同缜密起草研商,闻三二日内刘熙众代表来平”;“晋方自板垣派人催逼,去后尚无报告,但杨星如(杨爱源)派人来声明,阎在可能范围内,救国总不后人”。9月27日,徐永昌得悉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内情之后,立即向阎锡山汇报:“一、政整会取消,向方不能北来,刘熙

①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02—303页。

② “John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5, 1935,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Decimal File 893.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07—309页。

④ 岛田俊彦、杵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戦争(一),第126页。

⑤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5年10月1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440页。

⑥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5年10月7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442页。

⑦ 《殷同致何应钦电》,1935年10月10日,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第444页。

⑧ 《宋子文呈蒋中正函》,1935年10月15日,蒋档00208010300026013,台北“国史馆”藏。

众二次来平，未伸前题，迺谈华北局面，以为商不可靠，宋有大欲，均难拉拢。为消弭北方隐患计，莫若晋鲁先确实团结，对内对外完全一致等语，我以为此语完全系向方授意，盖对商、宋交恶，各走路线，不能贯彻其原来主张，既感不快，藉此收场。二、华北革命委会（即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之酝酿固出于关东军对中国整个的压迫，但宋、商双方正在此幕中各有作用，故两方面传出消息都须斟酌，我于未晤宋、秦前，认为出入尚多，是以不愿轻下断语”。^①

宋哲元、萧振瀛为尽早实现华北自治，急欲拉拢阎锡山和韩复榘。10月2日，宋哲元拜访徐永昌，提议与晋、鲁合作，实现华北自治，“华北在日本压迫、中央不管的处境下，不能不自己联合，阎先生首领、向方副之，咱们大家帮助办，实行李石曾的分治合作如何，我想请向方来，大家商议商议，大约十之六能来。”徐永昌不置可否，提醒宋哲元切莫因“一念之差，便身败名裂，为后世笑”。7日，宋哲元向韩复榘代表刘熙众明言：“时局紧张，吾人不能坐视，误国等于害国，向方最好来平一聚，熙众到平，可请徐主席晚走几天聚会聚会，说之再再。”^②

鉴于宋哲元、韩复榘等各派势力彼此各做主张、莫衷一是，此时无论是身处太原的阎锡山，抑或是北平养病的徐永昌，均认为由晋系主导华北自治根本无从实现，故而对待华北自治的态度又趋消极。10月10日，徐永昌向秦德纯直言华北自治不可为，“以一个武官或一个特务机关长指上几个中国流氓扰乱的恫吓，我们几省即从之独立，我们如此，河南、陕西亦如此，安徽、江苏亦如此，是不是中国将来亡国，是被日本一个武官指挥上刘桂堂，即可臻事有余。华北真要亡了，你我可以说是阎、宋、商、韩亡的，他人能不把你我加上么？”^③事实上，晋系自中原大战之后，实力已今非昔比，随着二十九军的异军突起，晋系固守山西有余，但掌控华北全局力所不逮。军政实力的强弱仍是华北政治博弈最为重要的现实规则。因此，保存实力、维持存在成为华北各地方实力派行为逻辑的关键，政治选择往往具有投机性与多变性，尤其是面对力量远超过自己的日军与国民政府，为避免引火烧身，地方实力派在抉择之时往往更加谨慎与善变。日军对此认知清晰：“华北各将领为了自己维持将来的势力，也深知与帝国提携亲善的合作十分必要。对于这种情况，南京政府的压力和牵制也十分强烈，一旦和日本联合、轻易和南京政府公开背离的话，会被南京各个击破，导致严重的后果。所以各个军阀都是非和别的军阀相联合，否则就不会轻举妄动，十分机智谨慎，他们都在逐渐变的青睐机会主义的做法。”^④

面对日军策动以及韩复榘、宋哲元的拉拢，晋系对待华北五省自治的态度，从初始的含糊其辞，转向顺势而为、主动参与，再至消极应付，看似反复无常，实则均以现实政治利益为依归，阎锡山所言“看利大害小出负责，即利害相半亦为之，如利小害大即不为”也就不难理解了。^⑤

三、华北地方实力派内部分化

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彼此合纵连横，尤其是在日方的压力与策动下，自治运动大有一触即发

①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10—311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12—314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16页。

④ 《北支各差领の态度》，1936年1月9日，支那事局报綴 C11110596600，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⑤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02页。

之势，乃至关东军信心满满地认为，“实现华北分离，用内部工作的手段即有达成目标之希望”。^①面对这一局面，蒋介石感慨：“华北局势危急，其病尚在内部之将领不明利害，不知廉耻与轻重也”，^②迅即采取措施，以图挽救华北危局。蒋介石对日方策动华北自治暗流并非毫不知悉，1935年7月5日，陈方向杨永泰密报：“日来北平谣言甚炽，撮要报告：（甲）阎韩商合作，推阎成新局面。（乙）中日经济提携后，日拟组华北国”。^③此后接连获悉的阎日合作密报，使得蒋介石不免心生疑窦，“在华北出现一个像日军期望的那样主要领导人，看上去并非不可能，谣言迅速蔓延开来”。^④但是在华北地区现有的军事格局之下，相较于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需要承受更多来自中央的现实压力，“根据业已签订的《何梅协定》，中央军禁止进入河北境内。同时依照济南惨案先例，中央军碍难出兵山东，否则日军将派兵保护当地日侨。因此，南京政府对冀鲁两省无能为力”。日本对于山西的得失更为忧虑，“但是值此之际，我日本帝国应该担忧的是原东北军和中央军可能会从陕西和河南方向进入山西一事”。^⑤与此同时，中共红军先后抵达陕甘，晋绥毗邻陕北，阎锡山倍感压力，曾向蒋介石报告陕北中共“日来澎湃甚速”，而“日方对兹极为重视，倘若澎湃，必以之藉口”，哀叹“山曾迭次电呈，此任绝非孙楚所能事，仍请钧座注意为禱”。^⑥因此，当阎锡山处在日军南下与中共、国民党中央军先后北上的三重压力之下，抉择之时更须考量中央态度。

即便1935年7月，阎锡山决定与日方展开试探性接触，仍旧不忘维持与中央的联络以获取蒋介石的信任。7月18日，阎锡山致电蒋介石，“国步艰难，一得之愚，屡欲派员密呈，难得适当人选，可否由钧座指派一人到晋，由山面请转达”。^⑦蒋介石迟迟未予回复，25日，他再次电蒋，请示可否派王靖国前往。26日，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王靖国“来川至为恰当，徐次宸（徐永昌）身为主席，现值华北外交紧张，阎未必准其远离，现既派王前来，故复电准之”，蒋介石当即允准。^⑧邵元冲27日抵达太原，阎锡山向邵元冲坦言，“日寇中无赖浪人，近屡来晋纠缠，作不負責任及无聊之语，并散布与晋已默契之风说，甚为烦闷”，希望中央对日外交“总应确定一方针，即究竟退让应至若何限度，对地方负责人亦应明示应付办法，否则，枝枝节节，地方当局颇感困难也”。^⑨8月3日，王靖国启程南下，此行目的“除报告对外态度竭诚拥护钧座外，并携有清折一具，内系孙楚部赴陕北‘剿匪’应需款项数目”。阎锡山希望以拥护中央为筹码，换取国民政府的财政援助，蒋介石悉数应允。^⑩

此时，晋系内部对与日合作实施华北自治意见不同，但主张向中央靠拢者不乏其人，阎锡山对此亦须有所考量。徐永昌向阎锡山明言，山西拥护中央“其目的在安定国家、安定山西及

① 松井石根日记》，1935年10月19日，支那事变日誌回想305，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②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5日，“本周反省录”。

③ 《管翼贤、陈方致杨永泰电》，1935年7月5日，蒋档00208020000236013，台北“国史馆”藏。

④ “General Sung Che-Yuan's Increasing,” September 13, 1935.

⑤ 《关东军参谋长より参谋次长宛电报372号》，1935年11月14日，中央战葬指导重要对策文书467，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⑥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5年8月26日，蒋档00209030000123129，台北“国史馆”藏。

⑦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5年7月18日，蒋档00208020000240019，台北“国史馆”藏。

⑧ 《阎锡山致蒋中正电》，1935年7月25日；《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5年7月26日；蒋档00208020000240019，台北“国史馆”藏。

⑨ 王仰清、许映湖标注：《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8、1300页。

⑩ 《钱大钧致蒋中正电》，1935年8月9日，蒋档00208020000456243，台北“国史馆”藏。

进行其建设，非徒以拥护中央、助蒋为目的也，希望主任以目的为前提，不必以私人为前提”，^① 华北危机的解决应待中央作最后决策，“因为日本国策在不要中国统一，凡是有统一力量的，日视之都如蒋，知己知彼也有分际，如做盾的不能听做矛的话，所以无论地方及中央，对外交只论应做与当做而已”。^② 8月29日，绥远省省主席傅作义又向蒋介石详细解释拒绝对日合作内情，“职前次到并（太原），日武官高桥晤阎主任及职，面提为防止赤化，拟在绥设联络员，经答以防止赤化，我中央已有整个办法，绥省刻正积极防遏，以绝蔓延，日在绥设任何名义之人员，均无权允可，须请示中央”。^③

对于蒋介石与阎锡山关系而言，蒋介石嫡系吴鼎昌等人先后向蒋介石力陈，中央惟有与晋系合作，方能稳定华北。1935年8月6日，吴鼎昌致电蒋介石，直言“阎百川对日持负责应付之态度，日方诱其反中央，单独妥协，阎已明白婉拒，故日方对阎不满，北方今日阎为最识大体、有责任心之人，望公与之密切筹商，示以机宜，嘱其负责应付”。^④ 正因如此，蒋介石对阎日合作的疑虑大为消减。蒋介石逐渐认识到“华北形势可危，其受倭煽惑，为中华祸首者，恐不在冀晋而在鲁乎”，^⑤ 一方面“对华北各省明告其方针与其各人之地位”，并请沈鸿烈“劝韩以大义与利害”；^⑥ 另一方面迅即展开对阎锡山的争取与安抚，试图将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各个击破，消弭于无形。

10月12日，蒋介石接获张学良来电，“谈阎颇有觉悟，态度极佳”，^⑦ 当即致电阎锡山翌日飞晋，“与兄相叙，如时间许可，拟当日回豫，万勿有所招待，免人注目”。^⑧ 13日，蒋介石“由开封起飞，十一时半到太原，下午与阎、赵协议各种注意问题。百川对土地问题，自信在山西有实行之把握，余未与详讨，但确有解决之必要，唯此时对共俄与外交关系，亦不能忽诸，谈至晚深十二时始息”。^⑨ 蒋介石向阎锡山明言：如果阎锡山能够说服华北将领，团结一致对外，可请阎锡山负责华北全局，并且该项工作所需经费由中央承担。此外，中央将赋予阎锡山统理华北外交、财政的全权。阎锡山考虑到山西经济萧条，接受中央援助政策有利无弊，决定出席南京全会。^⑩ 蒋介石对太原之行极为满意，“冀鲁与华北之动摇与对倭之方略，皆得由此巡视豫晋之一行而定，颇以自慰”。^⑪ 15日，蒋介石致电熊斌，令其转知宋哲元、商震，“阎主任态度光明，志意坚定，绝非已往之时可比，中可断定晋绥决不为日方威逼利诱所能屈，其对华北全局自甚关切，但彼决无领导华北之意。惟请明轩、启予兄随时与之切商，并推重之，俾得精诚一致，勿为日方间言所动，而且彼多有独到之见地也，只要华北各主官团结坚忍，则彼即无所用其技矣”。^⑫

1935年10月21日，晋系驻南京代表李子范向阎锡山报告，“日方对某公到晋颇多猜忌，近

①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77页。

②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293—294页。

③ 《傅作义致蒋中正电》，1935年8月29日，蒋档00208020000247092，台北“国史馆”藏。

④ 《吴鼎昌致蒋中正电》，1935年8月6日，蒋档00208020000456242，台北“国史馆”藏。

⑤ 《蒋介石日记》，1935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8日。

⑦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17页。

⑧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5年10月12日，蒋档00208020000255079，台北“国史馆”藏。

⑨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13日。

⑩ 岛田俊彦、杵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戦争（一），第130页。

⑪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19日，“本周反省录”。

⑫ 《蒋中正致熊斌电》，1935年10月15日，蒋档00202020000025073，台北“国史馆”藏。

日此间报纸载有钧座于开会时将来京一行，此言由何处造出，不得而知”，^① 阎锡山仍决定飞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26日分电韩复榘、宋哲元、秦德纯等，“山应蒋委员长之约，定于宥日乘机赴京，知关爱注，特电奉闻”。^② 蒋介石对阎锡山赴南京参会，极为重视，22日致电孔祥熙“代为照拂”。^③ 国内舆论界闻悉阎氏南下，悉表欢迎，《大公报》发表社论：“阎为北方重要负责之军政领袖，际此华北陆危，特入京出席党国干部之会议，又俨然十七年共同负责处理国事之精神，凡渴望全国同心协力撑持危局者，当无不引以为慰也”。^④ 26日，阎锡山抵达南京，蒋介石称赞“百川到京表示共赴国难之决心，其晚节自励，殊为可慰”。^⑤ 29日，蒋介石与阎锡山“谈话两次，研究外交问题，对倭应主动与之谈判，及对国民宣布方针，至最后不得已时，决心为最后之牺牲，如此或可转移倭寇外交之方针”。^⑥

就在晋系与中央关系日趋紧密的同时，二十九军却因华北权力分配问题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激化。随着二十九军势力扩展至北平及河北，何应钦主张由宋哲元出任驻平绥靖主任，如此或可使得华北局势趋于好转，“职意认为与其某方勾结汉奸及过去军阀政客组织所谓华北新政权，毋宁即以明轩为驻平绥靖主任，使负北平察省军事治安之责”，“且明轩人尚忠诚，颇识大体，钧座力加拔擢，崇其位置，必知感激图报，较之吴佩孚或其他不相干之人出而维持，似为利多害少”。^⑦ 蒋介石认为此举将使得中央对华北之影响更形式微，明确拒绝宋哲元出任驻平绥靖主任的提议，“故驻平绥靖主任之设置，不惟对内对外，皆无益处，且徒多纠纷，转为对方造一压迫挟制之对象，以明轩性情之忠诚耿直，必不甘长期忍受外人之侮辱，则最后必仍蹈此次华北事态之故辙，而更形惨酷狼狈，当可想像而知，决难久安其位，故为国家之利害得失，为明轩个人及为爱人以德之道义计，此举似皆不相宜”。^⑧ 同样，对于萧振瀛觊觎北平市长，蒋介石亦有意阻止，明言“萧事，当缓处之”。^⑨ 宋哲元因此“不免有怨望之声”，高桥坦又极力挑拨蒋宋关系，声言“明轩当日反抗日本，今渐知日本可恃，中央不可恃”，使得中央“疑宋哲元输诚日本”。^⑩ 蒋介石为避免二十九军倒向日本，10月12日与宋哲元代表王式九密晤，向其保证中央必为二十九军后盾，“如明轩不能在河北占住，则可退河南，我将河南给他，再不然可退陕西，必将陕西给他！”然而事与愿违，蒋介石此举非但未能起到安抚华北将领的作用，反而使二十九军与中央关系更趋疏离。宋哲元闻悉王式九报告“大哗”，怒斥蒋介石毫无诚意：“蒋言大半为诈，小半为实，且似始终未以华北为念者，且对事实问题皆未谈及，看起来，我们只能自行救华北矣”。^⑪ 萧振瀛与日方密谋合作，意欲使北平市市长袁良去职，由其执

① 《南京李子范马电》，1935年10月21日，蒋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②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五），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68页。

③ 《蒋中正致孔祥熙电》，1935年10月22日，蒋档00201020000147018，台北“国史馆”藏。

④ 《社评：最近之政局》，《大公报》（天津）1935年10月24日，第2版。

⑤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6日。

⑥ 《蒋介石日记》，1935年10月29日。

⑦ 《何应钦致蒋中正电》，1935年6月28日，蒋档00208010300022001，台北“国史馆”藏。

⑧ 《蒋中正致何应钦电》，1935年7月1日，蒋档00208010300022001，台北“国史馆”藏。

⑨ 《蒋介石日记》，1935年7月24日。

⑩ 李景铭：《六二回忆（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3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22页。

⑪ 《宋子文呈蒋中正函》，1935年10月15日，蒋档00208010300026013，台北“国史馆”藏。

掌北平，^① 局势急剧恶化，待至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宋哲元、韩复榘明确拒绝南下，并通电要求国民政府结束训政。与此同时，30日，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清水董三面见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出示天津日本总领事川越茂第226号公函，要求国民政府实施如下三项要求：罢免北平市长袁良；裁撤北平军分会；严格履行《何梅协定》、禁止排日活动。11月4日，天津驻屯军参谋中井增太郎向商震代转参谋长酒井隆口头警告，要求国民政府迅速落实川越公函各项要求，否则“我方取自由行动，其责任则应由贵政府负之，特此预为通告，即请转达贵政府”。^② “华北自治情势急迫，已到最后关头。”^③

阎锡山与中央旗帜鲜明的合作，使得晋系面临的日军压力剧增。“土肥原到津策动北方独立甚急，并称将派机轰炸太原，以惩阎之南下。”^④ 阎锡山鉴于蒋介石对日态度日趋强硬，颇多疑虑，乃至“阎先生似悔南京之行”。^⑤ 为消除阎锡山顾虑，11月24日，蒋阎再次会谈。阎锡山表示：“彼对华北愿负其责处理”，蒋介石认为，“中央对华北既不能派兵镇摄掌握，又为倭寇藉此以威胁，使全国政局求久不定，则不如另派百川，交其全权，使之应付，以谋一时之相安，如能耐过明年，则困难可以渡过矣”。^⑥ 25日，殷汝耕、石友三率领便衣队占领津沽保安司令部、天津市政府，殷汝耕又自行宣布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宋哲元部属雷嗣尚致电何应钦，建议中央默许华北自治，蒋介石忧心如焚，“闻宋哲元由津回平，土肥原亦已到平，可虑也”，旋又打消由阎锡山主掌华北的念头，改令何应钦北上出任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本日为处理华北与人事问题甚费研究为难，决心以华北全责交阎，但因事急，不能发表，甚歉也”。^⑦ 显然国民政府认为，由中央政府亲派大员在华北设置一个新的行政机关，要远比在日军压力之下形成的反对中央政府指令的地方政权更可取。^⑧

此时晋系与宋哲元等其他华北地方实力派在对日问题上，均主张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阎锡山声称：“一个人牺牲可以，若以国家民族来牺牲则不可。”乃至冯玉祥直斥“此话实大有病在，即秦桧一流之话也”。^⑨ 晋系与宋哲元、韩复榘的歧异主要因中央与华北地方关系展开，阎锡山主张中央主导华北对日交涉，宋哲元、韩复榘试图依靠华北自治谋求生存发展。晋系与国民政府互动更趋积极，不仅因为晋系内部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强烈主张向中央靠拢，更缘于日本与华北地缘政治的复杂作用。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宋哲元、韩复榘感触到的日军压力远较阎锡山为烈。同时，受制于济南惨案日本出兵山东的先例及《何梅协定》的苛刻限制，相较于河北、山东，中央军进入山西的顾忌要少得多，而中共北上陕西，又成为国民政府以“剿共”为由制约晋绥的重要砝码。贾景德明言：“韩、宋等之酝酿，中央已有所闻，蒋令‘剿匪’军追止

① “Comments on Current Events,” October 26–November 8, 1935, Correspondence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Relating to Gener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ditions in China, 1918–1941, MID 2055–62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② 《商震致蒋中正电》，1935年11月4日，蒋档 00208020000258016，台北“国史馆”藏。

③ 《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19日。

④ 《何应钦呈蒋中正有关雷嗣尚来函》，1935年11月11日，蒋档 00208010300020114，台北“国史馆”藏。

⑤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24—325页。

⑥ 《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24日。

⑦ 《蒋介石日记》，1935年11月25日。

⑧ “Pe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4, 1935,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between Republican China and Imperial Japan, 1930–1939; Records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 793.94/747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45页。

于甘境，若阎主任出总华北军政，蒋先生真能驱‘匪’于晋。”^① 由此而言，阎锡山与华北其他各实力派立场迥异，也就有迹可循。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宣布实施币制改革，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认为法币改革将威胁日本在华北的经济利益，主张加速推进华北自治，“最好让华北各省在经济上与南京中央政府分离，除此之外别无良策”，12日，致电东京陆军参谋总长，币制改革“为我方华北工作提供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事已至此，痛感日本陆军中央及派出机构有必要齐心协力，尽最大努力”。^② 在日军加速策动之下，萧振瀛与多田骏、土肥原密议，“发誓要和日本合作，但是需要驻屯军给予指导”。^③ 18日，萧振瀛在北平向报界表示，由于“日方要求立即实行，已商定展至号（20）日为止，否则日军当自由行动”，华北自治机关“暂定为华北防共委员会，宋为正委员长，韩副之，包括华北五省三市”。^④

国民政府为阻遏华北自治，迅即调兵北上河南，试图向华北各地方实力派施加军事压力。在此背景下，不仅阎锡山倒向中央，韩复榘态度亦发生变化。据何思源密报，11月10日，日本武官花谷正携带萧振瀛起草的“五省防共会议章程”前往济南，要求韩复榘签字赞同，“韩当时拒绝，经花谷再三要求，韩始允于‘五省防共’之条件下承认，但若缺少一省，或改变防共性质，则不受承认之拘束。当时韩与花谷及第三人某君均签字作证，花谷满意而归，韩大骂萧，谓不应听此无赖人之言，妄为举动”。^⑤ 在经沈鸿烈劝说后，韩复榘向中央保证“决不听日人之言前往平津，并不与彼签定任何协定，请为放心”。^⑥ 日本内阁命令驻华大使有吉明11月20日赴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涉，试图以华北自治为由，逼迫国民政府在“广田三原则”等问题上作出更多让步，华北五省联席会议无果而终。但有吉明与蒋介石会谈未达日方预期，日本陆军中央强烈反弹，认为“蒋介石接受了此前由广田外务大臣提出的三大原则，但是又以此作为日方敦促华北实力派取消宣布华北自治的条件，可谓居心叵测”，经与外务省、海军省协商，决定命令关东军、天津驻屯军继续推进华北自治运动，“应通过对华北实力派进行适当的指导，促进自治运动的实现。通过让南京政府加深对华北的认识，来促进其纠正对日态度”。^⑦ 宋哲元在日军压力之下，29日致电蒋介石，希望中央赞同华北自治，“近日征询多数意见，有主张如能在中央系统之下，政府予以适应环境办法，既不丧失主权，亦可应付艰迫外交，是否可备采择”。^⑧

如何安抚二十九军，实为阻遏华北自治运动之关键。阎锡山深窥其间症结，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坦承：“年来华北情形，还价每比要价高，此次紧张，其焦点亦在内而不在外”。^⑨ 11

①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15页。

② 《关东军司令官より俊谋総長宛电报762号》，1935年11月12日，中央戦務指导重要案策文书467，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③ 《松井石根日记》，1935年11月11日，支那事变日誌回想305，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④ 《日本侵华情报（二）》，国民政府档案00107055000007，台北“国史馆”藏。

⑤ 《何思源报告》，1935年11月，蒋档00208010300020102，台北“国史馆”藏。

⑥ 《沈鸿烈致蒋中正电》，1935年11月18日，蒋档00208010300020124，台北“国史馆”藏。

⑦ 《饮官より関东军支那驻屯军俊谋長、北平、南京、上海武官宛电报》，1935年11月25日，中央戦務指导重要案策文书468，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

⑧ 《日本侵华情报（三）》，国民政府档案00107055000008，台北“国史馆”藏。

⑨ 《阎锡山致孔祥熙电》，1935年12月2日，孔祥熙档案3/2，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月28日,宋哲元致电阎锡山,俾有所联络,“我公回并,华北有所依赖,北平环境困难,应付之术俱穷,请公指示一切,俾有遵循”。阎锡山当即转告中央对日政策,“中央对日决照委员长之宣言办理,提携亲善确具决心,我兄艰苦支撑,山在京时同人均表钦佩,此后对日希望在华北武官抛弃压迫做法,走入协商途径,刻正在交换意见中”。^①次日,阎锡山召集徐永昌、傅作义至太原会商,徐永昌“对最近河北时局及当局应付经过,均将有所报告”。^②30日,阎锡山决定派黄胪初亲赴南京面见蒋介石,“对明轩务尽力于消除隔阂工作”。徐永昌向黄胪初强调此举意义重大,“宋今时似走入不应付日本自治,即须与日拼,自治则中央不许,拼则恐失败后中央亦不收容,是华北之危险不完全在外也,所以中央对宋极需要急做消除隔阂工作”。^③12月4日,黄胪初向蒋介石转达阎锡山意愿,蒋介石当即承诺“如与日人决裂,以后官职、地盘、军饷毫不使其吃亏,并请阎先生担保,今拟定如明轩被迫不能立足,当担保以绥远省界之,其本人畀以察绥绥靖主任”,希望阎锡山“代为表示,并言我不负阎,即不负宋,可作两层保障”。^④阎锡山希望“先派妥人赍回委座亲笔书及禀函”,7日,黄胪初电阎,“今已上车,但钧座如感觉时局吃紧,可即照支西电对明轩表示,委座意甚坚,盼速办,不必候手书也”。^⑤

二十九军与晋系各成系统、互不统属,并且张北事件之后,“宋哲元痛感到身前背后没有靠山,十分寂寞,其所处的立场是将来不得不与日‘满’合作,以寻找打开局面的良策。宋哲元察觉到华北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就任平津卫戍司令。与此同时,宋哲元还通过收揽华北民众的人心,企图扩大和加强自己的势力”。^⑥随着萧振瀛与日本勾结日趋紧密,宋哲元颇有骑虎难下之势,况且绥远本属晋系势力范围,在视地盘如生命的逻辑之下,即便阎锡山书面承诺将绥远划为二十九军的后方基地,在宋哲元看来不过是虚妄之言。即如雷嗣尚向傅斯年所言:“你们不要拿宋哲元当圣人看,他是要地盘的,若非与日本勾搭,早调走了!”^⑦更不用说,宋哲元的权力诉求远非一纸保证所能满足,正如何应钦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所说,“此间一部分人(如萧仙阁等)拟在北平设一仿西南成例之政务委员会,在此预定之政委会成立后,拟与日方订三个协定”,^⑧以期游走于中日之间,希冀最终在华北政局中占据主导地位。

为应对日军策动的华北自治,1935年11月30日,蒋介石决定督促何应钦北上,出任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相较于此前废除的北平军分会、政整会,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的权限更为广泛,权力亦更加集中,其施政大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人事诸多方面。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希望其予以协助,“日来华北情势尤急,中央现授权敬之部长体察情形负责处理,顷已登车北来,同行者有陈公侠、熊天翼、殷桐生诸兄,特电奉闻,并希随时迳与电洽”。^⑨12月1日,阎锡山向何应钦表示将予以全力支持,已嘱石华严“就近晋谒台阶,如有囑件,请即令其转达为荷”。^⑩此时,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省已分别致电在华各机关,“值此之际,如果南京

① 《上南京蒋委员长勘戎电》,1935年11月28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② 《徐永昌到并谒阎报告》,《申报》1935年11月30日,第4版。

③ 《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35页。

④ 《南京黄胪初支电》,1935年12月4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35页。

⑤ 《南京黄胪初阳电》,1935年12月7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⑥ 岛田俊彦、杵叶正夫解说:《现代史资料》(8)日中戦争(一),第129页。

⑦ 《傅斯年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9日,蒋档00208010300019012,台北“国史馆”藏。

⑧ 《何应钦致蒋中正支申电》,1935年12月4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藏。

⑨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876页。

⑩ 《复北平何部长敬之东电》,1935年12月1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政府派大员去华北的话,会使得事态更加糟糕,有害无益,最好终止派遣大员北上的计划。当然,即便南京政府的这些要人向我日方提出面谈的要求,也要谢绝。对这些要人逗留华北期间提出的要求,决不能答应”。^① 何应钦计划依靠陈仪、殷同等“亲日派”与日本交涉的企图,无从着手。3日,日本陆军省致电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命令日军阻止由何应钦等南京政府要人处理华北时局,避免与何应钦会谈,同时要求华北地方各实力派与日方保持一致态度,最终令何应钦放弃北上执掌华北政局的想法。^② 4日,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表周永业提出警告:“如何部长久在此地,恐生冲突,而成地方上之混乱状态”。^③

宋哲元认为,如若他明确反对华北自治,日军必然用武力将二十九军从华北清除出去。同时鉴于何应钦北上并未携带任何具体计划,无益于改善宋哲元的地位与境遇。^④ 故而,宋哲元对何应钦北上看似欢迎,实则抵制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的设立。12月5日,北平爆发市民自治请愿游行,“闻此亦宋系之平市府自治监理处长吕均等包办,报界认为系演双簧,经密询道扬,亦不否认”。^⑤ 何应钦在内外压力之下,决定向日方妥协,放弃出任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的计划,改由宋哲元组建冀察政务委员会,7日,萧振瀛就冀察政务委员会筹设等问题赴津与日接洽。日方强调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是与政整会类似的机构,“设立上述机构无法适应华北的现状,反而有可能增加事态的复杂性”,主张地方实力派组建在地政权,^⑥ 但碍于英美态度,希望华北自治“应尽量避免采取过于强硬的手段,如果迫不得已,目前实现类似西南地区的自治也是日方能够忍受的”。^⑦ 萧振瀛赴津与日军沟通,日方并未予以否决,“首先应该承认这一委员会的成立,今后对其运营进行善意指导”。^⑧ 冀察政务委员会迅即成立。

伴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筹设,河北省省主席商震在华北政局内部被彻底边缘化。因“宋商之间不甚融洽”,^⑨ 宋哲元坚决反对商震留冀,“只允商军仍驻河北”。^⑩ 商震则针锋相对,主张何应钦留驻北平,反对组建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7日致电蒋介石:“闻何部长到平后,萧、秦等主张以冀察政委会代替伪自治,名义虽有不同,两省仍同断送,此种办法震意窃不赞同。”^⑪ 与此同时,商震亦向阎锡山表示此时华北政局“最要关键,总望何部长勿急谋解决,轻离北平,以留回旋之余地”,请求阎锡山“速与蒋委员长电商,另谋解决方法,或电何部长加以指示”。

① 《広田外务大臣より北平武藤书记官、天津川越総領事、濟南西田総領事宛電報》,1935年12月2日,中央戦務指導重要略策文書468,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

② 《炊官より関东軍支那駐屯軍俊謀長、北平、南京、上海武官宛電報》,1935年12月3日,中央戦務指導重要略策文書467,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

③ 《何应钦致蒋中正支西电》,1935年12月4日,蒋档00208010300019082,台北“国史馆”蔵。

④ “Gar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6, 1935,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nflict between Republican China and Imperial Japan, 1930-1939, Records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Decimal File 793.94/7492,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⑤ 《袁良致军政部李参事电》,1935年12月7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662010005,台北“国史馆”蔵。

⑥ 《広田外务大臣宛有吉大使電報》,1935年12月3日,中央戦務指導重要略策文書468,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

⑦ 《電報広田外务大臣より有吉大使宛326号》,1935年12月10日,中央戦務指導重要略策文書468,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

⑧ 《北支自治运动二就テ》,1935年12月16日,中央戦務指導重要略策文書464,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蔵。

⑨ 《熊斌致蒋中正电》,1935年10月16日,蒋档00208020000256027,台北“国史馆”蔵。

⑩ 《程伯昂致外交部电》,1935年12月8日,外交部档案11290102254,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蔵。

⑪ 《商震致蒋中正电》,1935年12月7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蔵。

阎锡山当即密电驻平代表石华严，“希密陈何部长，可否采纳启予之建议”。^①随后，阎锡山又致电蒋介石，反对何应钦南下，认为“如果回京，世人不察，必谓无办法而归，一则示弱，二则政府今后处置不易，华北事件善后更难”，强调“敬之兄南归关系甚大，请钧座注意及之。弟意对敬之兄在北平之困难，应极力设法援助，务期华北事件在敬之兄此去中，求解决之方”。^②为安抚晋系，蒋介石向阎锡山表示，“中央社所发布敬之日内南归消息，原属暂时和缓彼方，转移目标之一种作用”。^③

12月8日，阎锡山获悉冀察政务委员会接洽已获结果，由宋哲元担任委员长，“范围为冀察两省平津两市，组织大纲约与黄膺白政整会情形相同，如有单行条例，仍须请准中央施行，商将辞冀主席，有以萧继任之说”。^④次日，何应钦致电阎锡山，将北上内情相告，“弟此次北上本先与委座约定不就驻平长官之职，只将冀察事件处理告一段落即行回京，到平后，连日与宋秦萧诸人详谈，决遵委座指示之最后办法：（一）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二）委员及组织由中央决定，人选以适宜于北方环境为主，并任明轩为委员长。（三）一切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保持正常状态。（四）绝对避免自治名目及独立状态”。阎锡山仍劝何应钦“毅然就驻平长官之职，始可以稳定将来，善后已往也”。^⑤9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冀察政务委员会设置原则与组织大纲，“盖应付目前环境，稳定内部为先，对外顾虑尚属其次，非先谋一下台地步，亦殊难釜底抽薪”，“如日人压迫，中央与地方一致行动”。^⑥阎锡山明白此时大势已定，难以挽回，但特别就商震归属询问蒋介石，“否则恐爱国者望而却步”。^⑦11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华北人事安排，“启予兄调河南主席，明轩接河北主席，张自忠任察省主席，萧振瀛调天津市长，刘经扶（刘峙）改派豫皖绥靖主任，以上组织大纲及人事更动均拟于今夜发表”。^⑧商震既已改调河南省政府主席，阎锡山亦不再多言，表示“只好如此，请钧座注意善后为盼”。^⑨

何应钦强烈反对商震南调，认为鉴于《何梅协定》对中央军北调的限制，如若商震南调河南，三十二军“决难留河北，于将来国防上影响甚大”，^⑩“河北兵力单薄，一有事变，其他部队又难调集，殊为危险”；^⑪并且商震南调将加剧宋哲元与中央的矛盾，“宋部下每谓中央袒商抑宋，从前察省事件，中央免宋职后，两月余始予以卫戍司令之职。今若立即发表启予为豫主席，益予宋部下以口实，徒使其对中央发生不良印象”。^⑫蒋介石向何应钦坦言此举重在安抚晋系，“启予离冀而不以豫省主席位置，无论对内对外、为公为私，皆于理不合”。^⑬

随着商震及三十二军南调，国民政府受制于《何梅协定》，再难向河北增派军事力量，宋哲元悉数掌握冀、察、平、津四地主导权。面对中日与蒋宋多重矛盾纠葛的现实，宋哲元利用

① 《上南京蒋委员长阳亥电》，1935年12月7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② 《上南京蒋委员长阳午电》，1935年12月7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③ 《蒋中正致阎锡山电》，1935年12月7日，蒋档00208020000260073，台北“国史馆”藏。

④ 《北平石华严齐电》，1935年12月8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⑤ 《上南京蒋委员长蒸电》，1935年12月10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⑥ 《南京蒋委员长佳酉秘京电》，1935年12月9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⑦ 《上南京蒋委员长蒸酉电》，1935年12月10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⑧ 《南京蒋委员长真午秘京电》，1935年12月11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⑨ 《复南京蒋委员长真酉电》，1935年12月11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⑩ 《何应钦致蒋中正真午电》，1935年12月11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藏。

⑪ 《何应钦致蒋中正真巳二电》，1935年12月11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藏。

⑫ 《何应钦致杨永泰真亥电》，1935年12月11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藏。

⑬ 《蒋介石致何应钦真未电》，1935年12月11日，蒋档00208010300023001，台北“国史馆”藏。

《何梅协定》后华北“特殊化”的状况，多方折冲，最终使得二十九军迅速崛起为华北举足轻重的力量。12月12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承认：“事实上华北已经不是受中央统治的地方”，并且“中央已经只能希望宋哲元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① 阎锡山此前请蒋介石手书“对于明轩将来之实力与地位及官职等，必当确实为之保证，决勿令其失望”，已属毫无必要。当黄胪初派人至北平送来蒋介石函件时，阎锡山感叹“事过境迁，能否说起”。^②

结 论

华北自治运动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交互影响的产物，不仅是日本有预谋地蚕食华北、实施其侵略中国计划的重要步骤，亦是1935年6月《何梅协定》达成后，在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背景之下，华北政治失序、中央与地方矛盾冲突激化的结果。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自建立后，始终无法在华北实施全面有效的管辖，必须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方能维持中央在华北的政治权威。而地方实力派对地盘与军队的关注，与中央急于实现华北地方的中央化，形成华北地方政治的结构性矛盾。1935年华北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在日军侵略的外在压力下，被急剧放大，难以调和。中日实力悬殊，国民政府面对日军蚕食华北，妥协退让，毫无止境，特别是河北事件、张北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日军压力之下，被迫答允于学忠、宋哲元免职他调，不仅引发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焦虑，“北方军队之心理，深惧退过黄河，地盘一失，饷项无着，人各有心，何能持久！”^③ 更使得华北政治秩序紊乱，进而使得华北危机逐渐从外交传导至内部的政治冲突。冯玉祥向蒋介石建言：华北事件的解决，重在收军心、安地方，^④ 亦是此理。

日方为推动蚕食华北计划的顺利实施，有意挑拨中央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使得彼此冲突日趋恶化。商震与宋哲元矛盾冲突、萧振瀛与中央交恶，日方暗中策动，亦是重要原因。“萧为人粗暴，惟利是视，前欲为北平市长未偿，其愿欲为察省主席，而中央则发表张自忠代理，萧认为中央故意离间，又以高桥所造商氏请蒋公扣留萧氏之伪电，遂变本加厉，诋毁中央无所不用其极。”^⑤ 中央与地方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国民政府控制华北难以克服的关键性因素，亦是管窥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路径。

〔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天津 300355〕

（责任编辑：焦 兵 武雪彬）

① 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34册，台北：“国史馆”，2009年，第643、651页。

② 《致北平徐主席蒸亥电》，1935年12月12日，阎档131000007772M，台北“国史馆”藏。

③ 《徐永昌致蒋中正函》，1935年11月3日，蒋档00208010300026004，台北“国史馆”藏。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644页。

⑤ 《萧一山致朱家骅函》，1935年12月3日，蒋档00208010300019015，台北“国史馆”藏。

brawl ove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ir tally trade certificates in which Ming military soldiers and civilians were hurt, in what is known as the Ningbo Tribute Incident. The Jiajing Emperor's handling of the incident was clearly inconsistent, which aligns with the "secret dealings" of the Ming commander Yuan Jin, who had "gone over to the enemy." This story was more damaging to Ming author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than his being taken captive, so it beca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dealings between the countries of East Asia. After this event the Ming court showed a tougher attitude, but the tribute trade with Japan continued, while the Japanese side also actively sought ways to eliminate misunderstandings. Korea's deliberate avoidance of the "secret dealing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prevented the situation from blowing out further. In the contentions and compromises of all the interested parties, the story of "going over to the enemy" lost currency, giving way to the image of Yuan Jin as a captive; this became a mainstream account shared by all these countries. Self-interest ensured that all parties, whether intentionally or unconsciously, chose to repair and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 an expression of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s and historical rationality involved in serving big countries and pacifying little countries.

Mixed Claims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Merchants in the Shanghai Mixed Cour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Cai Xiaorong (86)

In the mixed claims involv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merchants in the concessions from 1909 to 1913, disputes were mainly over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but also included new areas such as trademarks, land and real estate, mortgages and guarantees, building contracts and personality rights.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American Consulate and the Mixed Court over litigation reflects many details of the American assessor's control of the court in cases involving American merchants.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legal proceedings and dispute resolutions, some Chinese and American parties to the disputes and foreign lawyers strove to maximize their own interests through negotia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legal cases involving Chinese and foreigners in the Mixed Court were nominally lawsuits but actually negotiations.

The North China Autonomy Movement and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Local Forces

He Jiangfeng (105)

The North China autonomy movement was the combined product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 It wa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tep in Japan's plan to nibble away North China and invade the whole countr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disarray in North China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appeasement of Japan after He-Umezu Agreement. The local power-holders in North China faced twofold pressure, from the Japanese and from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they agreed to appease Japan while retaining dissimilar attitudes towar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eopolitics became an importan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the different forces. In addition, Japanese encroachment an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s vacillation over its Japan policy intensified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amid the external pressure of Japanese aggression, forming a key factor that rendered it hard for the Kuomintang to assert its control of North China.

Edward Heath's Adjustment of the Atlantic Alliance Policy and the Rebuilding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Liang Jun (123)

In the early 1970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Edward Heath made major adjustments to Britain's Atlantic alliance policy, in an attempt to replac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ritain and the US with a "natural relationship" so as to facilitate Britain'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reby actively promote the European Economic